

《回到马克思(第二卷):
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
张一兵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凤凰好书6月榜

《回到马克思》的「深度」

读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二卷)

孙正聿

张一兵教授新著《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给人的强烈的直观印象是它的“厚度”——近一百五十万字的理论巨著。然而,在阅读这部理论巨著的过程中,人们能够受到震撼和启迪的则是它的“深度”:一是它“深度”地研究和阐述了马克思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二是它“深度”地回应和探索了马克思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三是它“深度”地参与和推进了国际性的马克思研究,“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一、“深度”地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思想

《回到马克思》(第二卷)是一部基于系统的文本研究的学术著作,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沿袭已有研究的理念和思路,而是“守正创新”地提出了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思想的新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作者明确地提出,这部著作的“真正思想旨趣”在于:“相对于哲学方法论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是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已经实现却隐而不彰的第三个伟大发现。”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正因为“资本”是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普照的光”,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才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一兵这部著作的“真正思想旨趣”,为研究马克思提供了新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

二、“深度”地回应和探索马克思研究中的重大问题

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不只是提出了新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而且为研究马克思提供了新的思想平台并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

这个新的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者明确地以具体的“语境”或“场境”为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平台,而不是仅仅从文本的字面含义泛化地阐述马克思的思想,因而在“语境”或“场境”的思想平台上,完整地、深入地揭示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从而形成研究马克思的新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并构成研究马克思的新的概念框架和思想平台;二是作者“勇于面对马克思所遭遇的当代思想挑战”,以“论争性和专题性的研究论著”,“深度”地回应和探索马克思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开拓了马克思研究的理论空间。《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副标题是“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两桩悬案”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深入地研究了“混乱不堪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辨识问题”,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围绕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所进行的绵延不尽的学术论争”。与此同时,作者还在这部著作中回应和回答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关于国内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研究和辩证法研究不在场的追问”等“诸多学术前沿问题”。正是在这种回应和探索中,《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不仅显示了它的“现实意义”,而且真实地拓展了马克思研究的“理论空间”。

三、“深度”地参与和推进国际性的马克思研究

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不只是直接地回应了国内马克思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而且直接地参与了国际性的马克思研究。这种“参与”的“深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是“综述性”地概括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而是以争论性的相关问题为聚焦点,详实地引证和分析国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命题,在切实的“对话”中阐发和论证作者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独立见解;其二,不是局限于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对话和争论,而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对话者的思想,从而为在具体问题上的“深度”对话奠定坚实的根基。这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在《回到马克思》的艰辛探索中,相继撰写和出版了研究海德格尔、鲍德里亚、拉康、福柯、阿尔都塞、阿多诺、阿甘本、广松涉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不只是“深度”地参与了对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的论争,而且在这种论争中“深度”地探索了马克思思想,推进了国际性的马克思研究。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第一卷)已被译为多种外文出版,并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也会在参与和推进国际性的马克思研究中,“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无处渡涉

评莫晓红《明月度关山》

姚苏平



2024年凤凰好书二月榜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莫晓红著
《明月度关山》

乱世流离,是人类的悲剧;乱世里的童年,是成年人对儿童的辜负和亏欠。回望浩渺历史,人类的太平日子并没有太多,这不由得令很多充满责任感与探索力的作家们,在书写斑斓与喧嚣辉映的当代故事、科技与玄幻交融的幻想文学时,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不忍于“过眼云烟”“雪泥鸿爪”的一带而过,在大时代的波澜里耐心地打捞童年的微末,致敬一个又一个孩子成长的仓皇与坚忍。《明月度关山》是作家莫晓红的一次灵魂“寻根”,是对祖籍顺德之风俗风情的凝望,是对抗战时期“广州—香港—南洋”区域的童年特写。

《明月度关山》的童年原生地是广东顺德,莫晓红用清丽的笔调书写了“桑基鱼塘”的水乡日常,正如她形容桑叶如“葳蕤生香的绿缎子”一般,整个作品的文字也氤氲着雅致的风范,由此成就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般的顺德风情。无论是松玉一家在养蚕时节严丝缝合的操劳,马蹄糕、虾饺烧麦、云吞面等吃食的家乡滋味,还是“一边听戏,一边吃点心,慢慢叹(享受)”的广式休闲,莫晓红对广东民间生活的稔熟令我怀疑她作为烟台人的真实性。更令人感动的是,她写出了那个时代粤人的侠义和刚勇。松玉的爸爸阿昌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康生活,夫妻和睦,一双女儿乖巧伶俐,他没有接受过传统私塾或现代学堂的教育,却自有一股知恩图报、爱国爱乡的情义。他本可以对参加革命运动的崇礼少爷敬而远之,但是他却为报恩而将崇礼少爷的遗体带回家乡,并因此受了重伤,最终不治而亡。文慧的父母打破了“为富不仁”的刻板形象,不仅同意文慧和穷孩子们打成一片,还用维护松玉尊严的方式接济着她的生活与学习。戏班的生计固然艰

难,可是班主任和大人们坚持让孩子们接受文化教育,期望他们将来不是受尽白眼的戏子,而是能唱新戏、能用文化武装自己的独立公民,更是能够为抗战而唱响国人精神的旗帜。

正是这场时代、地域、民风的狭路相逢,在1920—1940年间岭南至南洋的风云变幻,才孕育出松玉、阿媛、榴双、文慧、秀珠……这些女孩子们于人间悲欢中互为援手、各自闪耀。作品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松玉的形象,她本是小康之家、无忧无虑的么儿,因父亲伤亡、母亲失明而家庭败落,不得不到缫丝厂当童工、到富人家当陪读丫头,又逃到戏班避祸。她的成长起伏折射了中国近现代史中粤人因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出走南洋等而生成的特定场域。作者花了五分之一的篇幅,书写了松玉、姐姐阿媛和父母相亲相爱、敬业守业的日常。这是松玉原生家庭与生活环境的基调。正如阿德勒所言“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正是这段短暂却极为美好的珍贵时光,支撑着松玉在此后的艰难困苦中坚守善良、坚信未来。而那些着墨不多却熠熠生辉的女性群像,让松玉的成长不是孤例,而是在相互助力中如野草般欣荣。笔者以为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最动人的配角是姐姐阿媛,她是家中长女,勤劳懂事,和青梅竹马的阿瑾哥订下了婚约,两家又是品性良善的世交。这些幸福的“标配”在父亲猝然离世时被打碎。尽管父亲临终遗愿是希望阿媛早早婚嫁,但是她不忍抛下失明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主动退婚,当上了缫丝厂的女工,并远赴南洋为全家谋生计。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软肋是“不忍”,所以作品中阿瑾哥也去了南洋,他们就像格林童话里被各自流放到黑森林的长发姑娘与王子,何时能相逢?相逢时彼此是怎样的情状?莫晓红本可以写得千里共婵娟,但是她惦记着抗战硝烟、生灵涂炭,她要笔下的人物活出时代中最饱满的质量,所以阿瑾哥最终以募集南洋物资、护送其前往东北的方式消失在历史云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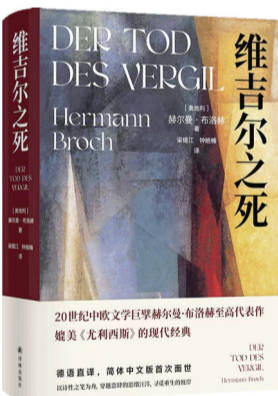
在童年苦难叙事中,作者多用个体的涉渡来消解对一个时代的直接碰撞。莫晓红的灵魂寻根是痛苦的,因为她既要写出“祖籍”里的岭南日常、粤式风情,更要写出一个时代童年直面苦难的韧性与力度。当她用琼楼玉宇般的文字书写国破家亡时,令人有焚香煮鹤的痛楚与无奈,也感慨这一“明月度关山”的童年叙事究竟渡涉了谁?这也是苦难童年的自我担当,也是一个时代不绝如缕的低吟。

(作者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在回望中重建生存方式

读《维吉尔之死》

韩继坤



2024年凤凰好书二月榜
梁锡江译
赫尔曼·布洛赫著
《维吉尔之死》

在20世纪中欧作家里,赫尔曼·布洛赫是不容忽视的一位。乔治·斯坦纳直言,“布洛赫是乔伊斯之后欧洲文学所诞生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尽管布洛赫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写出了其绝大部分作品,但中国读者直到最近十年才得以读到这位作家的文字,他最为复杂的代表作《维吉尔之死》更是到如今才由译林出版社首次推出简体中文版,这距原作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八十年。

赫尔曼·布洛赫在1886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商人之家,早年经商,后来对哲学和自然科学深感兴趣,三十九岁时进入维也纳大学系统学习哲学;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发现哲学的实证主义已经无法面对和解释趋于复杂化的现实和走向崩溃的价值体系。在此情势下,文学进入他的视界,成为他思考和处理价值和世界观有序化、统一化的方式。

转向文学后,布洛赫陆续呈现在世人面前多部作品,尤以《梦游者》《维吉尔之死》著名。《维吉尔之死》堪称布洛赫集大成之作,代表着作家对于文学在时代困境下的价值所在进行的更加深入的思考,以及由此而生出的疑虑。而布洛赫本人也由一位“诗人”变成一位“勉强为之的诗人”,心思和精力转往与现实联系更加紧密的活动,积极参与难民救助并就与战争缘起紧密相关的群众心理学开展研究。

《维吉尔之死》的创作和面世充满曲折。随着希特勒的上台,纳粹主义的盛行,让身处德语文化圈的布洛赫感受到生存与思想的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937年春,他开始了《维吉尔之死》的创

作,然而,次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及随后他本人的被捕入狱,带来了无限逼近的死亡体验,这也成为小说中着重反映的一面。侥幸从监狱获释后,他在乔伊斯等人帮助下,经由英国流亡美国,继续《维吉尔之死》的创作。1945年6月,经过前后八年里五易其稿,这部命运多舛的小说终于在纽约以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出版。可以说,这是一部与二战并进的作品。

在布洛赫酝酿和创作《维吉尔之死》的过程中,人类的生存与文化的发展因战争的到来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身为文学创作者的布洛赫更是有着切身体会。物理意义上的死亡曾经逼近眼前,在流亡中寻觅生存之道同样是一种考验,而借文学来认识、解读乃至改变世界的努力遭到挫折,这在精神上也给布洛赫带来压力。而如果将时间的视域扩大,就布洛赫的思想理念来看,自文艺复兴以降,人类赖以存在的价值体系逐渐失去统一和平衡,各种细分价值系统独立运行,相互之间不免产生隔阂与对抗,最终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过去已经不再而未来尚未到来的过渡时代,人类如何在迷茫中寻得出路,重建一种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的和谐生存方式,正是布洛赫借助《维吉尔之死》所作的时代思考。

《维吉尔之死》出版后,好评如潮。托马斯·曼认为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代表着文学史的发展”;斯蒂芬·茨威格评价道,“《维吉尔之死》是我们这个时代用德语以及所有其他语言写就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苏珊·桑塔格认为《维吉尔之死》是一部“伟大的、显示出耐心的长篇小说”,“并贯穿在一种巨大的思考力之中”。在法国《读书》杂志根据读者和专家意见评选出的“理想藏书”书单里,《维吉尔之死》极受推崇,名列德语文学书目第一。

然而,该书的翻译是一项艰巨的事业。由于作者采取意识流写法,将现实与梦境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近乎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使语言的复杂多义达到极高程度,给翻译带来巨大困难,这部作品直到如今才迎来第一个简体中文译本。国内最早研究布洛赫的学者之一梁锡江教授与青年译者钟皓楠通力合作,攻坚克难,反复打磨文字,共同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填补了外国文学翻译的空白。该书简体中文译本的出版,无疑将会扩大赫尔曼·布洛赫在中国的影响,加深国人对这位作家的认识。